

大会

197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

第三十四届会议

下午 3 时 30 分举行

正式记录

纽约

目 录

	页次
议程项目 5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a) 按照大会第 32 / 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953

主席: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议程项目 5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a) 按照大会第 32 / 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1. 主席: 我想提议, 参加我们今天开始审议的这一议程项目辩论的发言报名到明天即 10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5 时截止。我认为大会是同意这一建议的。

会议就这样决定。

2. 主席: 关于这一点, 我还想通知大会, 为了有计划的安排, 我将遵循议事规则附件 6 第 71 段中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即应请各国代表

“按发言报名先后次序发言, 而不能按此次

序发言的代表除与其他代表调换次序者外, 通常应改列在名单末尾”。

该建议于 1971 年经大会核推 [第 2837 (XXVI) 号决议]。

3. 我敦促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进行发言报名。

4. 现在, 我请挪威代表、根据大会第 32 / 174 号决议成立的全体委员会主席托瓦尔·斯托尔滕贝格先生提出该委员会的报告。

5. 斯托尔滕贝格先生 (挪威): 我很荣幸向大会提交全体委员会 1979 年度的报告 [A / 34 / 34]。提交这份报告使我们有机会评估该委员会的工作, 并探讨对其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

6. 我想简单扼要地回顾一些有关成立全体委员会的基本事实, 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析——其他人将更适合于进行这项工作——而是因为这些事实直接关系到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即如何加强南北对话并使之获得新的活力, 如何为建立更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指出努力的方向和目的。

7. 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在 1977 年夏天结束时, 人们普遍觉得, 尽管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做了细致的工作, 而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少成绩。有人对巴黎会议成果有限提出了各种解释。我不想再提出另外的解释, 而只是想陈述一下, 在那次大会之后, 人们觉得有必要使南北对话回到联合国来。那种在有限的讲坛进行对话的想法并没有使人们得到任何好处, 而且也证明是一种不可行的谈判方法。因此成立了全体委员会, 确保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权利和

机会参与这些对它们至关重要的事务。在大会审议关于举行新一轮的全球谈判时，我们应牢记这一事实。

8. 全体委员会是作为一个高级政治委员会而成立的，其宗旨是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谈判提供必要的动力。在大会1980年特别会议举行之前，全体委员会要以综合的方式处理南北问题。人们认为全体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年是毫无成效的。也许这是事实，特别是如果以其所印发的文本数目作为衡量其取得成就的唯一标准的话，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全体委员会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而且还得确定自身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作用和职能。全体委员会第一年的工作主要就是澄清这些问题，这项工作的整个过程是在我的前任主席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伊德里斯·雅札利先生的有力和积极的指导下进行的。由于他并非无足轻重的努力，全体委员会就其任务的解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得以进入谈判的新阶段，其第一个成果就是在1月份通过了一项文本题为“关于向发展中国家实际资金转移若干问题的议定结论”〔A/34/34，第1部分，第13段〕。

9.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理由说，关于资金转移的文本，尽管其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广，但却代表着前进的一步。在1979年5月和6月在马尼拉举行的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期间，令人遗憾的是货币问题和金融问题成了有主要分歧的问题。然而，之所以有可能就实际资金转移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体委员会在一月份举行的会议上达成了协议。

10. 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全体委员会成立一年之后已经走上了正轨，正进入南北讨论的中心。作为全体委员会的主席，我一直把加强这一趋势视为我的首要任务。我已作出最大努力使全体委员会作为一个能吸引政治注意并行使政治领导的机构来履行职能。与此同时，我也尽力阐明，我们在作出共同的努力，在这一努力过程中，联合国系统所有各个部分都有其自身的任务要完成，而且合作和相互支持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关于全体委员会是什么机构及其应有何种职能的这种概念现在已经确立了。

11. 我想谈谈全体委员会1979年的工作。全体委员会举行了两届讨论实质性问题的会议：一届是在3月份举行的，主要讨论粮食和农业问题；另一届是在9月份举行的，会议的议程涉及面很广，除其他之外，还包括全球经济形势、工业化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各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

12. 首先，我要指出全体委员会的成员、主席团、秘书处、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诸如世界粮食理事会、粮农组织、工发组织和贸发会议——不仅对正式会议的工作，而且对会前的筹备工作和广泛的协商工作作出了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贡献。我要强调指出，在各届正式会议闭幕期间所进行的事先筹备工作和协商工作是全体委员会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全体委员会主席的主要责任之一。各届会议的会期很短，因而全体委员会在3月和9月都是在时间极为紧迫的严重压力下进行工作的，通过这一事实就足以强调指出上述这一点了。

13. 全体委员会在3月举行的有关粮食和农业的第二届会议用全部时间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这是大会所设的委员会第一次这样做。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实，我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我不想分析全体委员会所同意通过的结论。其文本当然也已列入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同上，第二部分，第18段〕。然而，我想强调指出，这份报告已经成为一些重要会议的有用参考，这些会议有诸如粮农组织各次会议；7月举行的土地改革和乡村发展的世界会议，以及最近于9月在渥太华举行的世界粮食理事会会议。此外，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3月举行的有关粮食和农业的会议有助于更为迫切地将饥饿问题纳入南北对话中去。很明显，全体委员会在3月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有助于国际上为战胜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作出努力。这些努力的成功对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有人道和公正的世界秩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14. 我还认为3月份会议的结果有助于加强全体委员会的地位。当然，各国政府在会议之后以及在夏季期间所作出的反应表明已增进了对全体委员会及其前景的认识。我个人觉得这种趋势应该予以促进，而且在与主席团磋商之后，我与全体委员会的所有成

员国政府进行了接洽，以确保由高级代表参加 9 月的会议。我很高兴看到一些高级代表从各自的首都赶来参加那次会议。这与全体委员会的任务所体现的意图是一致的，而且如果全体委员会要在政治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话，这一点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5. 正如我所说的，9 月会议的议程特别紧。事实上，对每一议程项目都应该以 3 月会议处理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同样方式来予以处理。9 月份讨论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中心问题成了 77 国集团所提出的关于要求举行有关发展经济合作全球谈判的建议〔同上，第三部分，附件 1〕，各位代表都熟知这项建议及其背景。这项建议为我们提供了找到南北对话新起点的可行性，可赋予 80 年代全球性问题谈判进程以新的目的和方向。

16. 有些委员也许曾经对全体委员会未能充分而确定地处理这项建议而感到失望。鉴于全球谈判的前景和面临的挑战，我认为全体委员会不大可能在其有限的时间内深入研究该项建议的各个细节。尽管如此，全体委员会还是进行了严肃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决定将此建议提交大会，并建议大会把这一建议作为优先事项来对待，以期作出决定。由此就开始了重要的政治进程。在大会全体会议的一般性辩论和第二委员会就此议程项目的辩论中，许多代表团都对此建议进行了评论，又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就我所能作出的分析而言，这些评论赞成 77 国集团建议中所包含的主张，并表明了愿意在全体委员会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筹备工作。该建议的提案国选择全体委员会作为讲坛提出举行全球谈判的主张和进行谈判的筹备工作，我认为这是对全体委员会所投的信任票。我欢迎这种信任，也想强调，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并考虑到大会对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机构和讲坛而言所具有的权限，全体委员会是完全能够履行其所肩负的职责的。

17. 在全体委员会的 9 月会议上，为就有关工业化问题和最不发达国家及其他各类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文本进行谈判而成立了各个单独工作小组。77 国集团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建议。就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各类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文本谈判而言，我提请

参阅全体委员会报告〔同上，附件 4-7〕。我只想在此加一句话，即向全体委员会副主席之一、来自泰国的坤纳甲森先生致以谢意，他指导了这些谈判，并在其工作小组有限的时间内使之尽可能的深入。

18. 由于有关工业化问题文本的谈判涉及世界经济结构改革方面的主要问题，使谈判变得复杂化了。而且，谈判是按照即将在新德里召开的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的精神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谈判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促进这次大会的工作。

19. 该工作小组的讨论涉及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政治和经济各方面范围广泛的问题。谈判的核心是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并按照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¹加速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意义。

20. 众所周知，该小组并没有就文本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所涉问题复杂和时间有限而未能达成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未能达成与全体委员会所肩负的政治作用相应的解决办法。

21. 会议结束时，我指出，很明显我们的分歧的确是很大的，而在这个时候如此玩弄文字游戏，使全世界得出印象认为一切顺利，取得了进展，并达成了协议，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是指不符合我们大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利益。我认为——而且相信全体委员会也同意——承认我们有巨大分歧并如实告诉世界，这样会更好、更有效。这会使各国政府有机会去仔细找出问题，认真审查这些问题，并可望得出新的而且更富有建设性的起点。我认为公开承认我们确实存在分歧比寻找言辞去掩盖问题对我们更为有利。我还想强调，我们工作的政治影响是我们应时常牢记在心的。

22. 我也保证向大会报告我认为是分歧的主要领域，以使各国政府可以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23. 然而，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关于工业重新部署的问题，我认为工作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已取得了应被视为重要的进展。该小组为工业重新部署这一概念的定义奠定了基础。我认为重要的是，应保留这一基础，各国代表团不要从工作小组所达成的这一非正式协商一致意见后退。

24. 关于结构改革，多数发达国家认为这一进程正在进行，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还需要更多有力的行动。

25. 在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取消保护主义措施，减少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达国家认为这些要求影响太广。

26. 有关工发组织的协商制度，观点的分歧涉及到以下几点：这种协商是否须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政府代表是否应列入所有各代表团？最后，这种制度是否考虑实际谈判？

27. 最后，发展中国家认为，有必要在不受利马宣言条件限制下，将它们 在 2000 年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份额的指标至少定为 25%。这一点没有为工业化国家所接受。

28. 这些就是其中一些分歧的主要方面。我呼吁各国政府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以便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在明年初举行时能在这一重要领域采取新的积极措施。

29. 在我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要向来自厄瓜多尔的阿尔沃诺斯先生表示特别的敬意，他熟练而耐心地指导了工业化工作小组的工作。我可以让他确信，他在 9 月和前几届会议期间作为副主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已经得到了高度的赞赏。

30. 在不到一年后，大会将召开特别会议，对努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讨论并给予新的指导。尽管我认为特别会议不会为我们的问题和需要提供最后的答案，但是我确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场合，具体确定 80 年代的工作计划。我们不应该让这种情况陷入混乱。我们应抓住机会，从一般原则进入行动和贯彻实施的时代。

31. 这次特别会议将有两项主要的议程项目。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就是其中的一项，人们普遍同意在下一个十年期间及其以后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战略的极其重要意义。但是，我今天并不想讨论有关这一战略的问题，因为这一战略并不是全体委员会所要审议的问题。

32. 特别会议的另一项主要议程项目是有关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新一轮全球谈判。正如我已提到的，我认为人们普遍支持 77 国集团提出的想法，我也极力促请大会授权并责成全体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开始为这种谈判进行筹备工作。鉴于筹备工作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我建议大会在其将就此事通过的决议中列入一项明确的规定，确保全体委员会获得足够的便利设施——工作人员、会议室、秘书处的支持等等。只有当全体委员会能够在深入研究和筹备的基础上提出报告的情况下，1980 年的特别会议才能就举行全球谈判作出最后的决定。

33. 有时我们在谈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好象这是一个会在以后某个时候实现的目标。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中。因为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重要的力量——而且是越来越重要。我们的世界已不同于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期所形成的世界。当时定下的规则在 80 年代将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决定支持或是反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仅有的选择是，或者进行合作，促成必要的变化，或者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积极地寻找——实际上正如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所在的领域。

34. 我相信，当一切都谈了，也做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压倒那些看起来分裂了我们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想谈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好象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则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用来说明我们的共同利益。

35. 第一个问题是对南北谈判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受损。我不打算论证谈判不是一个给予和接受的问题。谈判确是这样。但是我们进行的对话涉及到一系列广泛的经济现实问题，而对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全球性的办法，并且，除了找出部门的解决办法外，还得找出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国际经济方面的各个议程项目。我们的目标是要促使国际社会的各部分融合成为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我确信大家通过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会得益，其结果也会是积极的。

36.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资源的可得性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性。我相信，大家普遍同意在努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也许这些会被认为是限制性因素，但是同时这些因素也当然地反映出我们具有密切的共同利益的各个领域。我认为，由于人类实际和潜在可得到的资源，这些因素不会妨碍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恰恰相反，这些因素强调了有必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37. 我们期待联合国能作出表率，我们应该利用联合国。但我要加上一句警告：我们不应滥用联合国。今天，会议的日程表如此之紧，使我们无法有效地工作。的确，我们大家的主要责任是要尽力确定好优先事项，以便使我们能最有效地利用本组织。

38. 我坚信，我们目前这样的形势，使我们有手段也有机会去建设一个形式多样但在努力为确保所有会员国的和平、正义和幸福方面都是坚强团结的国际社会。

39. 最后，我想——不提任何名字，这样也不会漏掉谁——向所有与我一道在全体委员会勤奋而富有建设性地工作的人致以深切诚挚的感谢。我们巩固了全体委员会的地位。只有未来才能衡量我们成功或失败的程度。

40. 纳拉亚南先生（印度）：世界经济的持续性危机是普遍深切关注的问题。在大会及第二委员会就此议程项目进行辩论中的诸多发言证明了各国对此问题的急切忧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深受影响，因为它们清楚地知道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不利情况的主要负担落在它们身上。的确，由于问题继续增加，而为减轻困难所采取的国际行动又未能奏效，使人们有遭到挫败甚至是无能为力之感。

41. 在自从大会第 6 次特别会议以来最近 5 年里，我们从事在各国间进行广泛的谈判，以便能有效地形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定。通过这一进程，我们一直把目标放在——在此我想引用主管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总干事最近在第二委员会上的发言——

“……广泛改变全球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格局，其中包括大大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和工业产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

总干事还根据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到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使它们能

“……充分而有效地控制利用它们的自然资源，让它们能真正参与国际经济的决策过程，并使这些过程更为有效。”²

42. 看到这些目的，谁还能满足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时在联合国系统内外进行毫无结果的辩论。但是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正变得更为尖锐。如果要使不使这些问题失去控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致力于寻找能促进我们共同利益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我们都认识到这些问题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个国家集团所关切的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得到解决。因此，有必要采取旨在振兴国际经济合作的大胆倡议和新的方法。

43. 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局势，77 国集团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新建议，建议举行一轮新的有关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让我强调指出，这是一项由发展中国家最高一级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业经上个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 6 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A/34/542，附件，第 6 节 B，第 9 号决议〕。随后又经 77 国集团在纽约通过，并提交全体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哈瓦那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会议的。后来，在纽约开会的 77 国集团外交部长重申了他们对该建议的支持〔见 A/34/533 和 Corr.1，附件〕。与我们对此建议所作的高度评价相一致，77 国集团要求在作为本组织最高讲坛的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辩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报告明确地将关于全球谈判的建议提交大会做出决定。我们这样做是想强调我们对这一思想所作出的深刻的政治承诺。我们要让此种思想受到各方的最大限度的重视。

44. 我已谈到在南北对话中谈判不断失败。让我再谈谈一些具体的例子以更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回顾一下，全体委员会是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设立的，以便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积极促进谈判进程。令人深为遗憾的是，全体委员会成立头一年，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都浪费在有关全体委员会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决定的程序争论上。大

会第 33 届会议全体会议的讨论结果产生了最后协议，使全体委员会得以继续履行其职能，但大大地损害了其有效性。

45. 的确，全体委员会今年的头两届会议成功地分别就有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源转移和有关农业的文本达成了一致的结论。但是，这些协议并没有开创新的局面，而且其内容几乎是现有协议的翻版，这些也是事实。在大会本届会议举行之前刚刚召开的全体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很可能形成一项类似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有关工业化问题的文本。我们承认全体委员会主席的评论的正确性，他认为这种性质的协议也许是不值得达成的。正如斯托尔滕贝格先生在那届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在其最后的扼要讲话中所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该正视在与全体委员会所处理的同样重要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分歧，而不应以议定的文本来掩盖事实，因为这些文本并不符合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主要要求。

46. 与全体委员会的那些进展相比，诸如贸发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的结果却都不能令人满意。最近在马尼拉举行的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未能达成协议以建立一个有效讲坛，使之能按需要对有关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政策进行持续协调的评价和指导。的确，贸发会议成功地就其他一些问题达成协议。³但在最实质性问题方面，尤其是在本来可为南北对话最富有挑战性的方面提供真正动力的那些因素方面，会议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47. 我已提请注意这些重要国际会议缺乏成果，以便强调指出国际社会现有机制的不足。要想重振并扩大对话，将必须寻找这样做的新的方法。77 国集团在建议举行新一轮全球谈判的同时也颇有这种想法。

48. 证明描述需要予以强调的这轮新的全球谈判的某些特点。我们要明确指出，这并不是想重复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全球谈判的目的在于一些具体的协议。在我们提交全体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中说明了谈判所限于的主要领域〔A/34/34，第三部分，附件 I〕。在这些领域范围内，我们在全体委员会的筹备过程中将可探讨选择一些足以引起重视的

具体问题和那些迄今仍无法解决的问题，并致力于这些问题，以期达成具体的协议。如不采取这种具体方法，就有重蹈巴黎会议覆辙的危险，巴黎会议采取了内容过多的综合方法，以致让具体细节掩盖了主要问题。正如 77 国集团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再次看到全球谈判要在严格的时限内进行。在此我们又得益于以往经验，以确保迅速取得确实的成效。

49. 77 国集团提出有关全球谈判建议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扩大了所讨论的问题范围。我要特别提到其中包括了能源问题。我们经常注意到发达国家提到能源问题，这些国家常常对南北对话各讲坛所讨论的问题中一般都没有这一重要题目而感到遗憾。发展中国家已得出结论，认为扩大对话范围使之包括这一题目是适当的，我们也据此提出了建议。试图孤立地讨论能源问题将是毫无意义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排除了那种不考虑问题整体性的方法。能源本身不仅仅被认为是一个价格或供应的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与基本天然产品有关的根本问题之一。我们衷心期望参加对话的伙伴会本着原定的对话精神接受 77 国集团在这方面的倡议。为各国日益关切的所有一系列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是经过考虑作出的努力。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采取一种综合并举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取得成功的最佳前景。

50. 我提请注意的有关 77 国集团建议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谋求大会承担与其地位提高相一致的任务。我们不希望全球谈判在任何有限的讲坛上进行，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实质性问题必须在联合国系统之内处理。联合国没有任何机构比大会本身更适合于此提供必要的动力并促使政治意愿得以实现，没有这种政治意愿，谈判是不能成功的。此外，大会本身还体现了普遍性原则的精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有人争辩说，谈判涉及 150 多个国家，将难以进行，还不如在较有限制的讲坛上进行，也许会取得较好成果。过去的经验并没有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记住，尽管 77 国集团现在有 120 个成员国，但是却总是从单一立场出发并通过为数极其有限的发言人进行谈判的。同样，其他各集团协调各自的观点并通过单一发言人表达其观点，这样有利于开展有条不紊的辩论并作出决定。因此，没有必要担心全球谈判

的安排会有什么不妥。如果我们碰到问题，那将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51. 自从 77 国集团决议草案首次在全体委员会介绍以来，我们听到有人表示怀疑将这些谈判与其他正在进行的谈判适当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些其他谈判主要是有关国际发展战略的谈判。事实上是否存在冲突呢？我告诉大家，77 国集团已非常仔细地考虑了新建议和战略谈判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 1980 年特别会议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些不同谈判之间丝毫没有任何矛盾。实际上，我们还希望这些谈判相互支援。我们设想 1980 年的头几个月将把战略谈判放在优先地位。这就要求筹备委员会召开三次会议，我们也期待着到特别会议举行的时候这项战略就已讨论完毕等待通过了。我们期望这项战略包括一整套全面的目标和政策措施，以符合其作为一份体现各国对今后 10 年时期作出承诺的文件所应具有的分量。在另一方面，全球谈判将处理原料、能源、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主要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在筹备过程中，将由我们来就这些主要问题决定我们所想集中处理的具体方面。当然，我们将处理重大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广度以及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限与这项战略的广度和时限是大大不同的，尽管它们并不相互矛盾。同样明显的是，并不是战略中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会在全球谈判中得到考虑。

52. 77 国集团提出的建议，设想由全体委员会充当全球谈判筹备委员会。尽管我们对全体委员会自从成立约两年以来不得不据以履行其职责的方式感到失望，我们仍然认为其任务范围广泛而灵活，足以使之能承担这项任务。全体委员会的任务期限明年届满，在明年的特别会议上，全体委员会将不再以目前这种形式存在。然而，人们希望全体委员会就其活动向特别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应包括一项议定的全球谈判的蓝图。尽管全体委员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但它仍然是吸引各国政府高级政治部门支助的讲坛。我们期望全体委员会在 1980 年的头几个月根据需要经常举行尽可能高一级的会议，以便为全球谈判做好充分的准备。77 国集团强调，全球谈判要取得成功就有必要做好充分和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们必

须避免巴黎会议所产生的那种程序上的难题。筹备工作还应包括草拟一份商定的议程这一复杂的任务，并澄清所有程序问题。

53.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谈全体委员会报告中的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全体委员会上一届会议议程上，除了专门有关工业化问题的议程项目之外，还有审议援助各特别类型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措施。会议无法就这两项议程项目达成任何协议。因此，全体委员会正式提请大会注意某些未竟之事。第二委员会有一项专门讨论工业化问题的单独议程项目〔第 57 项〕。77 国集团打算在此议程项目之下继续讨论全体委员会 9 月会议讨论未果的问题。就特别类型的问题而言，本集团对其建议未在全体委员会引起什么注意到遗憾。我们一再提请注意处境不利的各类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并促请采取国际行动以确保采取援助较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以及采取援助内陆、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具体行动。我们认为，认识这些问题对大会来说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将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建议。

54. 就我们的有关全球谈判的建议而言，大会已经知道了其主要大纲，因为这是全体委员会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保留向大会重新提交我们建议的权利。然而，我们并无意要求立即作出决定。我们认识到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不应仓促进行，因此，我们将寻求在适当的时候（也许到下个月中旬）与我们的伙伴进行谈判。我代表 77 国集团要求大会主席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必要的便利。鉴于该建议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坚决认为这一建议应由大会本身予以审议和通过。

55. 在全体会议和第二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过程中，我们听到了对本集团所提建议作出的许多初步反应。我们感激能作出积极反应的代表。我们也注意到某些方面的人士所表示的犹豫和所持的怀疑态度。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是会提出一些问题的，因为这一题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澄清，并以大家都能支持的方式变成为可实施的形式。但是，极为重要的是，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应原则上明确同意 77 国集团的建议中所述的各国对全球谈判所作出的承诺。该建议是为了解决那些对各国和实际上对全人类都具有重要利害

关系的问题所作出的认真尝试。尝试成功将受益匪浅，而在这一阶段原则上作出积极反应也不会失去什么。

56. 的确，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对南北对话作出政治承诺，并且表明它们准备与我们相互妥协，那么它们就必须表示它们愿意参加这一轮的全球谈判。我还必须加上一句，如果这些国家未能作出反应，那么这只能被认为是缺乏这种政治意愿的证据；而我们一致认为，没有这种政治意愿，则南北对话或令人珍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目标都不会有什么前途。

57. 阿克坦先生（土耳其）：在本议程项目之下，我们应审议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并按大会的要求修改全体委员会的任务，以便使之能为在1980年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举行新一轮全球谈判做些必要的筹备工作。正如土耳其外交部长厄克钦先生在其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的〔第21次会议〕，我国完全支持77国集团在这方面所提的建议。

58. 到目前为止，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可以被说成是对各方的已知立场无休止地进行评估和再评估的过程。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尽管有限，主要表现在口头上的相互妥协，而在少数实质性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还有待于进一步阐明或付诸实行。在发展合作方面，并没有在任何特别领域取得什么突破，在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普遍的进展。有些重要的问题被谨慎地置于谈判进程的范围之外。

59. 将能源问题纳入对话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和大有希望的一步。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牢记，国际经济合作会议除了作为由某些国家赞成的有限代表权的讲坛之外，还具有胜过全体委员会的优势。在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发达国家似乎决心抵制任何问题的交叉联系，而且也不容许作有意义的权衡。

60. 在这个时候把能源问题包括进来将有助于在对话中建立新的相互关系。这也将导致集团内部的重新组合，使一些强国站在前列，迫使它们承担与其力量相符的新的责任。简而言之，通过重新建立各问题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重新调整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改变谈判各方的结构，将能重振对话。

61. 但是，我们应牢记，将能源问题包括进来并不会自动地确保谈判取得成功。一切将取决于我们有无能力加速进展而不制造混乱，有无能力确定所赋予新文书的权限，有无能力明智行事，从而在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的机会和取得突破或全面进展的可能性之间保持平衡。

62. 我们将不得不在即将召开的全体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其后在新的一轮全球谈判举行期间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在这一阶段将我的讲话限于对话的现状是适宜的。

63. 那些听了在第2委员会所作发言的代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第一次普遍一致认为国际经济结构处于危机之中，这一危机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正如所预料到的，对如何才能最好地对付这一危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发达国家大声疾呼建立新的和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者，在它们主要考虑的与发展中国家这种受危机影响的关系方面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然而，它们好象并不认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解决全球危机的一种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办法。它们都强调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循序渐进性质，似乎暗示着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并不能通过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早日取得进展而得到满足。

64. 我想指出对话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建立一个新的平衡的世界结构，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到本世纪末将大大地缩小。我们对逐渐达到这一长期目标不抱任何幻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这方面的问题应同有关各机构规则改革的中、短期目标区别开来。这些改革应是结构性的，人们希望这些改革会导致大量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并使之制度化，从而成为有保障的和持续的，发展中国家是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中、短期目标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来判断工业化国家所采取的态度。

65.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论点用以解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展缓慢甚至微不足道这一情况的，就是发达国家目前和今后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和低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失业问题。一再强调只有在全球增长的

条件下，才能试图进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要求的根本改革和调整。

66. 尽管如此，目前经济增长缓慢却是由于各国经济没有根据变化中的国际条件作出相应调整的直接后果。除了调整之外，没有其他能恢复经济持续增长的办。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开放制度。因此，首先要有调整国内结构的意愿，其次也要有相应的调整国际结构的意愿，这两者就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最为缺乏的政治意愿。

67. 同样，相互依存的进程已经达到了比我们大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深的层次，并形成了相互从属性和由此而来的脆弱性。在这种条件下，进一步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进一步的相互从属和脆弱性，这种前景激发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强烈的自卫本能，特别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环境里更是如此。这种动力驱使一些拥有良好的本国应付机制的强国通过单纯向国际社会条件较差的国家输出自己内部困难来对付相互依存以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

68. 但是，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有其局限性的。尽管发展中国家由于急需加速增长而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由于其财富所产生的严重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谁也不确切知道何处自己的权力终止而他人的权力开始，因为各国都互相卷入彼此的福利之中。因此，在这个相互依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方能加深他方的从属地位而不相应地加深其自身的从属地位。

69. 从经济上来讲，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增加使这些国家加深了从属地位。工业化国家缺乏结构调整不利于债务的偿还。这很可能造成大量的不履约，对世界金融制度和发展中国家日益缩小的市场起着潜在的不稳定作用，并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停滞的世界经济中所起的反周期作用。

70.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讲，维持目前制度的代价正很快地变得难以承受，即使对于这种制度的赞成者也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遵循这种制度的代价很久以前就已经相当大了，因为现有制度阻碍了它们的增长。没有任何需要付出

如此之大的维持和遵循代价的秩序能够存在下去。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制度的利益分配是否不均，而在于发达国家的长期福利能否完全依靠维护这种违反发展中国家重大增长利益的不公正结构来予以保障。

71. 在这可见的瓦解过程中，现有秩序所具有的好处和动力正在削弱，而惩罚的作用却好象在增强。目前，对发展中国家可转移资金的有限性为这些资金的持有者提供了强有力的进行政治控制的机会。另一方面，有人为了在短期内维持这种显然是有用的控制手段，往往限制这些资金转移。然而，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抑制性的政治维持代价，大大超出了所预期得到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许会被迫采取极端的办法以求生存。等以后再来批评这种由于某种不让弱者有生存余地的国际秩序而造成的国内极端分子建立的极端政权所犯下的暴行，这岂不是伪善吗？

副主席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代行主席职务。

72. 我们知道，自从19世纪开始以来，已两度建立了新的秩序，每一次都由某个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领域拥有无与伦比权力的国家建立的。我们也看到了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建立了自己的相当重要的权力中心之后便向结构权力提出挑战，并得以进行于它们有利的某些结构调整。该国或该国家集团拥有有效的国家杠杆，如经运用可以造成相当大的损害，这一事实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能源迄今尚未被用来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发展，而除了能源之外，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都缺乏这种能在谈判中起有效作用的常规杠杆。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的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适应于北方的集团内部关系的，而对南北关系却毫不相干。

73. 我们看到建立目前这种秩序的那个国家在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一些能够单独地或集体地逐渐扩大目前秩序基础的国家都不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北方拥有对南方的特权地位并较成功地使这种制度的主要内容适应于北方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因为它们看到自己在全球改革中将有很大的损失。然而，如果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失败，而国际经济关系普遍出现混乱，那么正

是这些国家将面临重大损失，因为它们完全依赖着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市場。

74. 历史上第一次有占人类大多数的一批不发达国家想通过谈判对世界秩序进行结构改革。在这方面的努力中，能源作为杠杆的重要性具有补充作用，但不能根本改变这一进程的性质。在争取建立新秩序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也许不能给北方造成很大的直接损失。但是，笼罩在发达国家头上的严重威胁却是发达国家由于回避或拖延执行与建立新秩序有关的措施而给自己带来的潜在损失。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认清在这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错误行动和我们由此遭受的损失冲击之间所存在的因果联系。

75. 我们深知，发达国家的前景分析和研究以及开明政治领导都无法使各该国人民大大改变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希望随道德发展而定，因为道德发展通常并不是结构改变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不幸的是，我们面临着在争取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秩序的过程中所固有的传统难题。未来秩序所隐含的长期利益一时还无法说明，但却是深入人心的。对照之下，短期的政治应急需要和长远政治目标之间确定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未来秩序的好处是要在付出代价之后经过一段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出来。

76. 我们觉得保护主义和抵制调整要比目前的经济困难问题更大。相互依存的问题已触及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中心，从而使安全的概念有了更广泛的定义。由此产生的限制相互依存以减少脆弱性的动力，随着调整进程的放慢而结束。而这一点又反过来使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大大下降，同时由于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失业却在不断增加。

77. 然而，如果继续拖延采取有效的全面结构调整措施，以及不愿意将足够资金导向发展中国家以试图减轻对业已陷入困境的调整的潜在压力，那么就势必会造成持久的不良国际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可能会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可能切断发展过程和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进口商品之间的联系。发展中的边缘现代部门与中心部门相联系，并依赖着中心部门，在这种情

况下就将首当其冲，并且其中的精华部门将面临破产，因而反倒增强了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反力量。认为有人会在以后一个更为恰当的时候制止这种情况的发展——这种情况的发展是久积而成的，因此在超过某一点后几乎是无法扭转的——那只能证明是幻想。在目前这种两极政治秩序下，这种情况的发展可能会对全球平衡起破坏作用，从而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78. 在这种暗淡前景的笼罩下，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要做些什么，发达国家提出的“基本需要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式的。我们承认其中的有关消灭普遍贫穷方面有很重要的人道主义内容。但是，这种办法要求调动比发展中国家现有可用于发展传统部门的资源还要多得多的国内外资金。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概念相比较，这种办法，如果想取得成功，就不仅需要发展中国家对国内结构作根本改革，同时也要对国际体制作更多的全面改变，从而对工业化国家的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未能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案变为现实，那么它们最终也许还得采取这一基本需要办法。

79. 然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可以定下一些要求较为不高的目标，诸如促成确实停止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条件，大大增加关于援助、信贷和国际收支支助方面的资金转移，减轻债务负担，等等。

80. 19世纪的唯一结构强国向世界其他各国其中包括当时的先进工业国实行非互惠性的贸易自由。今天，西方国家也应该能够集体地向发展中国家实行同样的自由，只是不要予以分等级和区别对待，因为这种做法只会耽搁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

81. 我们必须记住，所有全球规模的伟大事业都是在极为困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由具有非凡胆识的人发起的。然而我们应该首先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困难是不会自行解决的。

82. 科雷亚·达科斯达先生（巴西）：作为77国集团的原始成员国，巴西只能完全赞成印度代表作为77国集团的发言人代表77国集团在大会开始审议本议程项目时向大会发表的讲话。我们完全赞成这一讲话，还因为巴西也确实有同样的看法。

83. 我们好象都一致认为世界陷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好象没有就如何面对这场危机达成一致意见，至少是日前还没有。这场危机并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方面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的，但都严重地影响了它们，而且其影响之大又如此的不相称。发展中国家尽管并不是危机之根源，却在付出它们承担不起的代价，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代价最终也会要求发达国家付出高利息的。

84. 我们此时正在讨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全体委员会并没有按其应做到的那样去真正迎接挑战。就算是在某些领域达成了一致的结论，但是全体委员会迄今还几乎没有起到其成立时所肩负的作用，即在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有限办法受到挫折之后，全体委员会应该成为继续进行南北对话的主要政治讲坛和联络中心之一。

85. 但是由于对我刚才提到的政治作用的信息，77 国集团又再次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政治一级审议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也由于同样的信念，77 国集团建议——其建议我们大家正在审议——举行一轮有关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

86. 我不想在此详谈该建议的细节，因为我们的发言人已很好地谈到了。我只想补充几点。

87. 大多数最近举行的国际经济谈判，特别是与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有关的谈判，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失败了。全体委员会这一级的谈判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 77 国集团将其建议的全球谈判视为一种新的办法，这种努力是全球性的，因此将具有另一长处，即引进过去明显缺少的政治投入。我们听到有人说全球谈判审议的各个领域大多数都是由各个不同讲坛处理的，但是事实是这些讲坛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可让发展中国家——或就此事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称之为非常积极的成果或重要的突破。我们需要成果。我们需要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再也不需要分析、评价、评估或列表——这一切我们已经太多了。

88.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77 国集团的发言人在全体委员会的上一次会议上介绍全球谈判的建议时强调

指出，本集团建议的是谈判的“范围和程序”。一旦本集团的基本设想得到大会这一最高机构的接受，本集团对其他内容将虚心听取意见。

89. 巴西一直相信并且仍继续相信联合国在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加紧目前正在进行的多边谈判是很重要的。建议举行一轮全球谈判的目的并不是要使那些多边谈判停滞不前，而是要给这些谈判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同时，我们坚信应避免新机器的增加，因为这些机制本身并不产生任何成果。

90. 在承认经济危机和作为整个危机的重要部分的能源危机需要新的解决办法的同时，我们应准备正视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巴西正是这样采取切实的办法来看待全球谈判的。谁也不要再来一次巴黎会议，由于某些我不必多谈的原因，巴黎会议没有实现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在倡议召开该会议时所抱的崇高希望，或者说没有实现国际社会——包括参加和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与他所抱的共同希望。

91. 我们将这轮全球谈判视为一个恢复已明显失去的南北谈判势头的进程，巴西相信大会将很快同意举行这轮谈判，以便在 77 国集团和南北对话范围内尽快开始筹备工作。77 国集团想出一个有时限的、同时并举的综合方法。但是，其目的并不是要使建议谈判的各领域的所有问题都得到处理，因为如果是这样意图的话，那么全球谈判就会甚至尚未开始就已注定要失败了。

92. 我们也相信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将证明是能够就全体委员会工作的其他领域达成协议的——这些领域有工业化问题，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问题——我们至今都没能就这些领域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93. 在结束我的扼要讲话之前，我要向全体委员会主席挪威国务次官斯托尔滕贝格先生，致以我个人和巴西代表团的敬意，他强有力地领导了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刚强有力是他个性的特点，我们非常欣赏。在重申我们对他的信任的同时，我们相信他的熟练的领导才能将继续为我们

大家所珍惜的事业服务——这一事业就是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

94. 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距今天约一年以前,大会举行全体会议研究根据大会第32/174号决议成立的全体委员会提交的报告。1978年间全体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原因是某些发达国家拒绝在全体委员会进行真正的谈判,并且拒绝以正式决定同意这些谈判的结果,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局势,本组织的最高机构在此情况下进行这项审议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大会在那个场合通过澄清全体委员会的任务而克服了困难局面。而且,大会通过的决议〔第33/2号决议〕还强调全体委员会有必要就提交给它的问题取得真正的进展。大会还在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对所谓“程序”问题的解决办法本身并不是目的。

95. 大会现已决定在全体会议上再次优先审议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这一决定是完全正当的。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和1979年举行的一些主要会议所作出的努力并没有产生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所希望的结果。相反,这一切只是证明了所谓的南北对话现已陷入的目前危机。

96. 事实上,尽管全体委员会主席斯托尔滕贝格先生坚定不移地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行使他的权力,对此我们一开始就想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们却必须承认全体委员会的工作成果特别令人失望。正如各会员国所知道的,由于国际谈判在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原则变为真正承诺方面的进展缓慢,因此人们清醒起来,对全体委员会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是,该委员会只能确认已就资金转移和粮食问题作出决定。

97. 一个月前全体委员会举行的第三届会议的工作更加表明了南北对话的现状,因为会议除了工业化问题之外并没有就针对各特别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

98. 事实上,上届会议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明确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变得更为明显了,这一点可以从某些发达国家的行动看出来,它们试图向诸如受影响最严重类型的国家和世界

工业结构改革等业已确立的决定和概念提出挑战。

99. 如果我们研究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我们就可以找到有关这一点的确凿的证据。这些谈判采取三方谈判的形式,而让发展中国家靠边站。而且,区别对待和较优惠待遇基本原则和非互惠基本原则都没有得到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本是作为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措施的基础的。

10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该组织的某些决定只不过是发达国家采取的获得批准的单方面措施,诸如关于浮动汇率、黄金非货币化和黄金价格上升等措施。尽管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了调整——这是由于艰难的经济形势而不得不作出的调整——这种调整可以说是积极的,而且规模也是大的,但是,这些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范围内的地位。

101. 我们刚提到的两个讲坛都失败了,加上贸发会议第5届会议所取得的结果不大,而贸发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解决贸易和发展问题的最后手段。例如,值得注意的是那次会议并没有就议事日程第8项达成任何协议,尽管主题是有关结构调整,而77国集团在此范围内提出的建议确实也只不过是程序方面的建议。正如各会员国所知道的,这些建议是要求建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就发达国家的短期政策进行协商的机构,并请秘书长进行一项有关管辖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原则的研究。的确,会议通过了一项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方案。当然,我们对此是很高兴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项方案可能无法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实施,因为发达国家已对方案的经费方面问题表示了保留意见,而这一点却是方案的基本因素。全体委员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发达国家在全体委员会上拒绝接受关于到1982年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翻一番的原则。

102. 在联合国这里,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虽然已协商一致地通过了第33/193号决议,从而确立了未来战略的纲领和范围——在经过一年的辩论之后仍由于一些概念上的分歧而停滞不前,使编写基本文本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03. 犹如驱除落在当今南北对话身上的疾病，对最近举行的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⁴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给予了强调。但是，我们应承认，很遗憾的是，那次会议并没有在贯彻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重要的突破。

104. 事实上，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拖延战术和通常是貌似有理的理由，以反对 77 国集团就某些根本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诸如科学与技术的转让和发展，跨国公司的作用和现有制度必需进行改革——例如，取消对技术信息的保密——以便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等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完全失败，象其他国际集会一样，这次会议通过了基本上是制度性的一些规定——建立一个政府间的全体小组和设立一项临时基金——其有用性和有效性还有待于根据今后作出的贡献来予以评估。

105. 对 1979 年举行的国际经济谈判进行这番简单的描述，说明国际社会面临困境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正日趋严重。

106. 发达国家为了替其不尽力进行辩护，也间接地提到了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它们经常将危机完全归咎于石油价格的上涨。正如它们在马尼拉所暗示的，除非能源的问题也成为谈判的题目，否则不应期望它们采取促进发展的决定性行动。

107. 目前经济秩序出现的危机并不象刚才有人所希望的那样已经能够得到解决，危机还远远没被克服，现在危机还很深重。如果找不到补救的办法，那么将会有不可预测的后果。

108. 但是，事实清楚地表明世界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是由于发达国家坚持采取一些荒唐可笑的短期政策，这些政策极不符合客观现实，也不适应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生产分工所需的基本变革。

109. 这些政策加剧了结构上的不平衡，因此使通货膨胀紧张、货币动荡和国际贸易失调成为一个长期的特点。

110. 主要储备货币的价值每天上下波动，不可预测，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保护主义的扩大正成为

各主要国家经济的常态。难道我们应对目前国际经济气候的不确定性感到惊讶吗？

111. 然而，我们应强调指出这种失调恶化了发展中国家业已不稳定的局势，但是相反却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发生危机，那些国家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却是较高的。要想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国家自 1950 年至 1970 年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因为这些增长率都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破坏之后重建它们的经济有关。

112. 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因为随着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以及将经济危机的过重负担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上，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极限就越来越明显。

113.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已达到极限无法继续起承受经济危机负担者的作用，它们到目前为止为发挥这种作用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偿还外债的负担过重，出口收入的实际价值和货币储备减少，这一切影响了它们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能力。

114. 这样，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动乱不仅扰乱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而且也日益威胁着发达国家本身的稳定和繁荣。

115. 鉴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并且独家操纵着货币和贸易的杠杆，仅此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国际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行为和行动。

116. 似非而是的是，尽管发达国家的传统经济政策失散了，它们还是从简单地调整制度看到了世界经济复苏，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引起目前世界经济危机、造成和加剧不发达状况、因此也恶化了世界贫困状况的根源。

117. 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对话常常不是用来妥善准备就所有国际经济问题进行真正谈判，而是用来延长现有的秩序，这还要引以为怪吗？为了大家的利益，发达国家有必要停止其不断努力保卫自己在国际经济结构范围内的既得利益，这些经济结构已证明是

不合时代的、不公正的、也是无效的，甚至对大家，其中包括传统上的受益者发达国家在内，都是危险的。而事实上，发达国家似乎尚未承认这种必要性。

11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还要通过强调世界发展问题中的相互依存、基本需要、区别和非全球化来设法掩盖真正的问题吗？

119.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对于这种仍然存在剥削、不平等和依赖关系的情况，我们就会混淆因果关系。

120. 因此，继续将目前的经济危机归咎于石油价格的变动，并设想只通过单纯解决能源问题来改善经济境况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也是错误和有偏见的。

121. 很明显，这种方法无异于要求那些只不过对并非自己酿成的事件作出反应，以便限制——其实只是极为部分地限制——这些事件对其经济所造成后果的国家无任何交换条件地放弃它们用以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的唯一王牌。

122. 有些人很少关心其经济决策对第三世界所造成的影响，但正是这些人今天却强调发展中的石油输出国没有充分考虑它们的决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23. 用这种观点来看待能源问题是极为错误的。这意味着完全漠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对石油供应和价格所表现出的负责精神。关于供应问题，应该强调的是，有些人急于指出的某些生产国的财政盈余，却首先正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水平是为了满足世界经济的需要。如果它们关闭管口，停止供应，它们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减少出口，它们也要受到指责。关于价格问题，人们好象忘记这样的事实，即石油价格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冻结了 18 个月并无任何明显的改善，而价格方面的加权平均数只是反映出 1973 年的实际价格，且只是代用能源成本的 50%。

124. 如果大家接受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能源可能会限制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那么就必须及时考虑一切可能的影响，以防止笼罩着我们的苦难。

125. 在这一方面，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还是取决于发达国家的适当决策。很明显，我们不能继续目前的趋势，目前生产出来的石油有 80% 以上是供工业化国家消费的，而在这些国家中稀有的碳氢化合物资源经常被滥用于生产可以用其他能源生产的产品，而这些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其他能源。

126. 这些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消费，保护非再生资源。这就需要在它们的生产 and 消费格局以及资源分配和使用方式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换言之，基于剥削和滥用资源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增长计划应予重新考虑，并代之以符合世界各族人民利益的加速发展。

127. 阐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想再次宣布，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随时准备与工业化国家就能源问题进行谈判，只要这种谈判也包括——我强调这个“也”字——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所最为关切的问题。

128. 这既不是拖延战术，也不是原则上的理论立场，正如 77 国集团在全体委员会正式提交的建议所表明的，全球谈判应该讨论能源、原料、货币与金融问题和发展问题，这项建议博得了发展中国家而不论其是否石油输出国的完全支持。

129. 大会本届会议应就此建议作出决定，这是目前这场辩论的主要目的。这将使我们有可能进入一个对话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对话要取得成果就必须充分考虑公正、互利和国际合作的原则。

130. 从过去几年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非我们处理好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这个全球性问题，否则是不可能保障世界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平衡的。

131.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全球的方式来看待谈判，对作为谈判组成部分的原料、能源、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等问题应同时予以考虑，以便在各领域取得进展。

132.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对话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即应共同努力找出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持久和积极的办法。

133. 工业化国家提出了好些有关全球谈判的范围、议程、组织和目标的问题。决议草案本身〔A/34/34, 第五部分, 附件 I〕已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某些答案。但是, 很明显, 我们只有在筹备工作方面共同努力, 才能找出大多数问题的答案, 我们建议筹备工作在全体委员会进行。

134.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其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非常恰当地强调指出:“面对着显然是紧迫的经济需要, 谈判进展如此缓慢是不可能接受的”〔见 A/34/1, 第五部分〕。他作出结论说, 南北对话应得到新的动力, 而这一点正是发展中国家提出建议的目的。

135. 秘书长强调指出只有想达成协议的真正政治意愿才有可能提供这种动力, 我们当然也同意他的看法。这种意愿在南方国家里一直都存在着。发达国家还有待于确立这种同样的政治意愿, 其方式就是在本届会议期间接受我们所建议的进行全球谈判的原则, 然后再竭力寻找考虑到公正、平等和互利原则的解决办法。很明显, 在国际经济关系急需调整之时, 不能把互利的概念简化成为保障原料供应以换取资金转移的简单等式, 在转移是“自愿”的、因此也是不确定的情况下, 更加不能如此做。

136. 目前人们呼吁大会作出的决定是一项原则性的决定, 一项政治决定。我们要看看国际社会在面南北对话结果甚微的时候会不会联合作出反应, 并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危急形势, 开始进行有关各重要部门的谈判, 以便产生一套连贯的解决办法, 使每个成员都能得益; 或者国际社会会不会拒绝承担责任, 无能为力地袖手旁观, 听任目前局势的恶化, 因而加强民族利己主义, 并从而加剧已经出现的危险。

137. 正如我们在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期间所强调指出的, 全球谈判的建议并不等于要设立另外一个讲坛。其实, 增加讲坛常常只是某种无能为力的表现, 或者至少是在影响着我们大家的事件面前缺乏政治意愿来一起采取有效行动的表现。

138. 虽然 77 国集团的建议并没有涉及要建立一个新的常设机构, 但在另一方面却是隐含了一种新的精神。谈判的成功将取决于每个会员国是否有决心

为在必需——这种必需是大家所承认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解决共同的问题而作出贡献。

139.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关于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会议上讨论根据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成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的问题, 我很荣幸地代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团讲话, 并作以下发言。77 国集团建议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会议上讨论有关在公正和公平的基础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现状, 社会主义国家以理解的态度看待这个建议,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样, 对 1979 年全体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经济机构的工作结果所体现出来的在这一领域缺乏真正进展的状况感到很不满意。

140. 全体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结果证实了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决定成立该委员会当时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全体委员会关于其他讲坛提交的许多复杂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取得重大的进展。从广义上讲, 与会者成功地完成的只是确认前已通过的立场和协议。当然, 这一切损害了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设想本身, 事实上, 该委员会的第 3 届会议——众所周知——是以失败告终的。

141. 多年来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作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而 1979 年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讲坛上举行的有关当今世界最为相关的经济问题的谈判缺乏重大的进展。这一切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集团造成的, 它们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 旨在延长和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并反对消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歧视、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及其他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冷战”残余, 它们就是以这种方式顽固阻碍从根本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它们竭力保护现行的国际分工制度, 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西方的生产原料附庸。它们正在日益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并将其困难的负担转嫁到发展

中国的身上，为此而利用目前在贸易、经济、货币和金融关系中的这种不公平机制。

142. 社会主义国家在包括全体委员会在内的联合国各机构中屡次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要真正在公正的基础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联合国各会员国就必须开始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第 3201 (S-VI) 号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 3281 (XXIX) 号决议〕的进步规定付诸实行——正如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在处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所做的那样。

143. 77 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于 1979 年 9 月 29 日发表的声明〔A/34/533 和 Corr.1, 附件〕非常正确地强调指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种族隔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对外侵略诸如占领、统治、霸权、扩张主义和剥削等，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解放的主要障碍，我们衷心同意 77 国集团外交部长的呼吁，即国际社会各成员应加紧采取最大胆和最具体的措施以结束这些可耻的现象。

144. 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与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哈瓦那会议所表示的同样决心：

“……反对许多由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控制的经济和金融机构企图强行采取旨在限制国家主权的措施，并企图阻碍各国人民沿着自己自由选择的经济和政治路线发展的基本权利。”〔见 A/34/542, 附件, 第 4 节, 第 15 段〕

145. 说到底，在公平和民主的基础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结果还将取决于以下方面，即事实证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打破国际垄断集团的抵制，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进步建议——特别是关于必需保证对自然资源拥有真正主权，必需对外国资本实行有效的控制，包括对跨国公司的控制，以及贯彻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革和措施，以期充分调动国内资源。

146. 就联合国而言，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强调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问题不应通过设立新的机

构去解决，而应通过更为有目的地和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合法机构——特别是第二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去解决，这些机构有充分的权力和经验来审议和解决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中所有的各种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设立联合国的新的机构只会使人们幻想能对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步骤，而事实上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增加机构只会不适当地分散精力，这样就更难以解决主要的任务，即迫使反对力量表明政治意愿，并开始执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进步规定。

147. 发展中国家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全球谈判”将是有益的，并且指出它们的目的是促进在公平、公正和民主的基础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我所代表发言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考虑了这种观点之后并不反对关于筹备和举行这类谈判的建议。但是，我们还想再次强调指出，在这里不应将问题缩小为谈判的主题，事实上谈判正在联合国各经济机构中进行。在此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是主要与会者、特别是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与会者的政治立场实质。

148. 我们深信，任何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制度有关的未来谈判要保证取得成功，就必须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进步规定为基础，并且在进行谈判的方式上应充分考虑到对国际和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全球因素，诸如促进国际缓和的必要，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停止军备竞赛和采取真正裁军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会腾出大量的额外资金可用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149. 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打算继续积极参加有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工作。

150. 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始终如一地执行其参加联合国经济机构的工作所涉及的主要任务之一，即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在公平的基础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方案的进步规定提供政治支持。

151. 在贸发会议第四届和第五届会议上和联合国其他经济机构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了一项具

体方案，旨在实现进一步扩大和增强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平等国际经济合作。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努力确保使该方案所载建议和原则转化成为与有关国家在双边的基础上达成的具体协议的安排。

152.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并准备继续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尽其所能地向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以帮助它们努力解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争取经济独立的问题，并且与它们发展互利的贸易、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式是与它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相一致的，在实践中证明了其优点，并且赢得了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承认。

153. 安致远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认真地听取了全体委员会主席斯托尔滕贝格先生的报告和纳拉亚南先生的发言，愿就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发表一些意见。

154. 从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成立全体委员会起，两年的时间即将过去。两年来，全体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委员会的工作在许多实质性问题进展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委员会的经历可以看成是整个南北对话的缩影和象征。

155. 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面临南北对话停滞不前的形势，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认真贯彻大会第六届、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议，倡议建立全体委员会这一国际机构，以便解决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谈判的困难。

156. 在全体委员会建立的第一年里，由于在委员会职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始终未能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一直到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不懈的斗争，挫败了那种把全体委员会变成一个空谈机构或变成仅仅是大会 1980 年特别会议筹备机构的企图，才明确确定了全体委员会是一个谈判机构，并且有权作出采取行动的决议。这样从今年起，在斯托尔滕贝格先生的主持下，全体委员会就资金转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谈判。委员会从辩论程序问题进入到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这应该说是一个进展。

157. 在今年举行的三届会议上，77 国集团先后就资源转移、粮食与农业、工业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文件，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关系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强调，全体委员会的谈判不应仅仅重复其他机构已经作出的决定，而应该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少数经济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先是阻挠全体委员会进行谈判，谈判开始后，又顽固坚持它们的错误立场，有时甚至从其他机构已经达成的协议上后退，终使谈判未能获得重大突破。全体委员会虽然在资金转移、粮食与农业问题上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谈判结果极不满意。全体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刚刚结束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谈判陷于完全破裂。而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的内陆国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迫切问题的谈判也未取得多少进展，这就不能不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体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失望。中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全体委员会未能完成其预定的任务而感到遗憾。

158. 尽管全体委员会没有能够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我们在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中，清楚地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剥削、掠夺和垄断的原则立场，坚持了大会第 6 届特别会议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方向，在一些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找出了分歧的焦点和实质，为以后解决这些问题作了有益的工作。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积极参加了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它们在谈判中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协商，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比较合理的态度。我们欢迎这些国家采取的这种立场。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回任主席。

159. 这里，我想讲一讲那个自称是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对全体委员会的态度。从一开始，这个超级大国就不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反对建立全体委员会。全委会成立后，它又极力限制和贬低委员会的作用，反对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在今年三届会议的谈判过程中，不论讨论什么问

题，它总要在有关文件中塞进它那套假“裁军”、假“缓和”的旧货，以此转移会议的正确方向，拖延谈判进程。在上月刚刚结束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谈判中，它竟然对《利马宣言》确定的 25% 的指标横加挑剔，散布怀疑情绪，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严正驳斥。这个超级大国还试图将一种相当奇怪的逻辑强加于人：每当全体委员会工作遇到挫折，它就喋喋不休，想以此来证明其反对全体委员会立场的“正确”。大家知道，全体委员会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倡议下，为推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现而建立的一个重要国际机构。这个超级大国对待全体委员会的否定态度，完全暴露了它阻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对发展中国家假支持的真实面目。

160. 在全体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全球谈判的建议。我们认为，在当前南北对话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重要的建设性倡议。我们一贯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尊重独立、主权和真正平等基础上的积极对话，探讨并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建立公平合理和基于平等互利的新的国际关系，是解决当前国际经济问题的正确途径。我们支持在联合国范围内就涉及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注意到一

些发达国家对这一建议已经作出了响应。我们希望更多发达国家能拿出诚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中国代表团将积极参加全体委员会的工作，为筹备一轮新的全球谈判作出自己的贡献。

161. 在结束我的讲话以前，我愿向全体委员会主席斯托尔滕贝格先生表示谢意，并祝愿他在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对话和平等合作中作出新的贡献。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

¹ 见文件 A/10112，第 4 章。

² 见文件 A/C.2/34/4，第 2 页。该文件载有此发言的全文，该发言还以摘要形式发表在《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第二委员会》，第 4 次会议，第 20-34 段，以及同上，《第二委员会，会期分册》，更正。

³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议事录》，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9.II.D.14）。

⁴ 见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1979 年 8 月 20 日至 31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9.I.21 和更正）。